

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史研究

姓名：闫华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陈国庆

20100606

中文摘要

高陵地区天主教从晚清时期开始正式传入当地，发展至民国末年，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其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传教活动的起步和传教基地的建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民国的恢复与发展等四个主要的阶段。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并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不平等条约为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大力传播和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高陵天主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迅速发展的。在这个时期，历任主教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适时的调整传教策略和方针，使得天主教在当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他们致力于修建教会各种建筑，完善教会内部各种机构和设施，由此在当地及陕西教区形成巨大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陕西地区名副其实的传教中心，在陕西天主教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兴办教会学校及各类慈善事业，在当地形成较好的影响，并且客观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高陵，通远坊，天主教，主教，信徒

Abstract

Gaoling area Catholics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officially introduced at the local,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to the Republic experienced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At this stage,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cludes the initial 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mission base establish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4 the main stage. During this long history, accompani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Opium War, China's door is opened, and was forced to sign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unequal treat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China's great efforts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vid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gaoling Catholic Church is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 During this period, successive bishops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combined with specific local conditions, timely adjustment of missionary strategy and policy making at the local Catholic Church has been a great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all kinds of buildings,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and facilities within the church, thus the formation of local and Shaanxi enormous impact on the diocese and ultimately develop into a veritable missionary center in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Shaanxi occupy an importan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Moreover, the Church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set up religious schools and various charities in the local formation of better impact, and an objective to promot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Keywords: Gaoling, Tung Yuan Fang, Catholic Bishop, the faithful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闫平 指导教师签名： 陈永明

2010年6月6日

2010年6月7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闫平

2010年6月6日

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主旨与写作思路

陕西地区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天主教势力相当强盛，高陵地区更是自晚清开始便成陕西全省及后来关中地区天主教的活动中心和传播中心。天主教势力在这一地区发展大又快，在关中地区以及国内和国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自明朝开始陕西便有天主教的出现和传播，高陵地区是关中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中心，尤其是高陵通远坊一地更是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历史上历任陕西教区的主教都常驻此地，主持教区内的各项宗教事务，因此有力的推动了这一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天主教在这一地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开放，此地的天主教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地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势力，产生巨大的影响。鉴于此种现状，很有必要对此地天主教发展历史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多方查找和翻阅资料，发现对于这一地区天主教的情况学界并无多少的关注，更没有专门性文章和著作，所以笔者拟对这一情况作深入研究。

本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在于对这一地区天主教流传的历史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这一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历程作准确地把握，为更多有意愿了解这一地区天主教情况的学者和人士提供较为详备的资料，同时为政府在宗教方面的工作提供更好的历史和理论依据。也希望研究工作和成果能更好的促进这一地区宗教力量进一步良性的发展，真正实现宗教与社会其他力量的和谐发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有更多更好的帮助。

元朝时，天主教便在当地进行传播，但是到清康熙时期，由于天主教某些教义与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理念的冲突，引发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并最终导致康熙帝对天主教的禁教，由此开始了天主教历史上的“百年禁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随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速传播的时期，不仅一改康熙时期开始的地下传教状态，传教活动逐渐开始完全公开，并且由于得到了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宗教活动在各地全面展开，教会在各地大量修建教堂，修缮各种设施，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同时，清末民国是天主教自唐朝以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陕西高陵一地的天主教从清末开始逐渐进入当地并最终发展成为天主教在陕西的重要的

传播中心，其发展的速度之迅速、规模之大是以往天主教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同时由于1840年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不可避免的外国宗教的传入也具有一定的殖民侵略性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宗教权力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这也是这一时期宗教传播的特点。鉴于晚清民国时期天主教传播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本文的写作时间是从清末开始直至民国末年。

在具体的写作上，本文将立足于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历史来进行描述，以天主教在当地的时间发展为主线，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根据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可将其发展历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发展，这是天主教进入高陵一地并初步发展的时期。（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这个时期，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虽然经历许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得到了发展，并为以后的辉煌时期奠定了基础。

（三）民国时期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天主教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民国前期是发展最为迅猛的。在描述中，文章也将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由于当地天主教发展壮大正是处于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描述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历史时将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及当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且注重该地区所具有的历史发展独特性。同时伴随着中国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性质的独特性，这一历史时期高陵地区天主教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发展时期的特点，这就使得当地天主教自身的发展传播方式也不断的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国特有的国情，所以文章在撰写时也将关注这些特点，以期更好的展现当时当地的宗教历史面貌。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性的著作和文章来研究高陵地区天主教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传播状况，仅仅是一些涉及天主教历史的著作中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作简单的提及。这些著作和文章有：

《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李伯毅，载于《中国天主教》2000年第1期 本文是教会内部人士的作品，对于高陵县通远地区的天主教历史情况作了非常详细地介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章。但由于是教会内部人士的作品，并且只是介绍某一教堂的历史，所以多有偏颇之处。在具体的内容上只谈及对教会有益的方面，对其他不利之处多避而不谈。所以在进行参考时应多方查找资料，去伪存真，以期更好的还原历史面貌。

《高陵文史》，此书由高陵县文事委员会编写，在《高陵天主教史概略》一文中较为

详细的记叙了从元朝至解放初期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历程，并且从教区分布、教徒的发展、教堂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对于文章的撰写是一个较好的参考。

《基督教与陕西》，王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本书了足于对陕西整个地区基督教发展历史，非常详尽的阐述了基督教在陕西地区自唐朝传入至二十世纪末的整体发展历史。由于天主教本就属于基督教教派，并且陕西天主教从十九世纪起，其发展传播的中心便在高陵地区，所以本书便不可避免的将高陵一地天主教的发展传播历史纳入其中，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此书对于本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顾裕禄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在本书中将天主教自唐朝进入中国以来的历史作了较为细致地描写，陕西地区是天主教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传教的重要地区，而陕西地区从清朝末年以来，传教中心便在高陵地区，所以本书对于陕西地区天主教清末以来的历史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高陵一地天主教历史发展背景的叙述。所以此书对于文章的撰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高陵县县志》，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在县志宗教一目中对天主教发展的历史作简单的介绍，这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天主教历史情况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依据。

1.3 研究方法

本文属于地方宗教历史研究论文，一方面采取文献分析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档案，掌握基本的历史史实，理清基本历史线索，并在地方史志，野史杂记，文士别集等历史文献中认真爬梳找寻相关线索。通过这样研究方法，最终深化对天主教自身发展特点及对当地造成巨大影响的认识。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所以还必须进行一定的实地访谈。

天主教在高陵县在晚清民国发展的历史是本文主要研究及探讨的重点。由于年代遥远，缺乏文史资料，所以对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缺乏丰富文献史料。为了获得较为详实而可靠的历史资料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访谈，所以除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需要走访当地的统战部、政协文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以及省地市档案馆等多家机构，收集不同时期的许多宝贵历史资料，同时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大量走访当地有关部门和人员，其中包括长期从事教会工作的相关人员，以及教会内部人士口述撰写的

有关教会发展、活动情况介绍和回忆录，还有当地现存的教士碑文墓志等。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本文最大的优点。

1.4 概念的界定

天主教属于基督教一个教派，在教义上两者区别不大，在国内也大多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准确的说两者不是同一个教派。天主教也称罗马公教，其名称“天主教”是罗马公教传入我国之后的名称。^[1]关于其名称的正式确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1 世纪初，东罗马帝国的教会与西方的罗马教宗正式分裂。之后，东派教会称“正教”，也就是“东正教”；西派教会称“公教”，即“天主教”。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后者以罗马为中心。唐朝时，基督福音传入中国，称为“景教”，但那时的景教并非真正的天主教。到元代，罗马教廷与元朝建立了正式关系，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地区建立了教堂。但当时并未出现并使用“天主教”一词，而大多以基督教或基督会士等词统称进入中国的外国教会，或者以基督教内部派别名称如多明各会士等称呼。16 世纪末，罗马公教再次传入中国，他们被称为“耶稣会”，这也是经过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的。^[2]为了使宗教信仰能被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来华的“耶稣会士”（也被称为传教士或神父），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耶稣基督及造物主（拉丁文 Deus）音译为“陡斯”，但是由于此名称过于西洋化，不被中国人民所了解和接受。这种情况的改观直到 1584 年。这一年，与利玛窦同时期来华的罗明坚神父在肇庆刊印了他的著作《祖传天主十戒》^[3]。在他的著作中首次提出并明确使用了“天主”一词，他将基督教中的“造物主”称为“天主”，如“要诚心奉敬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勿呼请天主名字而虚发誓愿”。^[4]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对天崇拜的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讲“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将造物主与“天”联系起来，无疑是最符合中国人民的传统信仰的。同时，为了这一著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人所接受，罗明坚在做此书时还特意与福建一位秀才一同润色修改多次之后，才最终进行刊印。^[5]在他之后的利玛窦继承了这一做法，继续沿用“天主”一词。1595 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初刻于南昌，1603 年，在北京再刻印《天学实义》（《天主实义》），这一年《天学实义》经澳门耶稣会批准后正式样行，当时天主教被称“天学”、“西学”、“道学”等。“天主”这个称谓经

[1]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

[2]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5

[3]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59

[4]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80

[5]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80

教会正式定名后,《天学实义》被改为《天主实义》。^[6]在此书中,对中国原有儒家思想予以肯定,认为可与天主教沟通,书中称天主为“天”或“上帝”,是据中国经书上之意义(《诗经大雅大明》),但是1704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禁止此称呼,故后来改去“天”及“上帝”等字样,但是“天主”、“上帝”在中国开始并用,随之“耶稣会”也被称之为“天主教”。

天主教内包括耶稣会、方济各会、多名我会、遣使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修会。陕西的天主教在康熙之前及康熙时期为耶稣会士,如汤若望、南怀仁、杜奥定和方德望等人就属于耶稣会士,他们受北京耶稣会组织领导,这些人在陕西工作了近六十年,直到1696年因为“礼仪之争”康熙禁教。礼仪之争的具体原因是因为较耶稣会士后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为了同耶稣会争夺教区而引发的。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教民的尊敬孔子和祭祖的传统持支持态度,而方济各会则持反对态度,双方为此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康熙帝支持耶稣会士的主张,而罗马教宗则袒护方济各会士的意见,禁止耶稣会的主张,并最终于1773年7月取消了耶稣会。康熙帝随之也禁止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而此后,陕西的传教最终被方济各会取代,高陵地区的天主教也是一直被方济各会控制的。这是从晚清天主教进入高陵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

^[6]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21

第二章 天主教在高陵地区传播的背景及早期情况

2.1 高陵地区的地理人文环境

高陵是陕西省西安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西安市的北部、关中平原的腹地，泾水和渭水从境内流过。它东临临潼县，西界泾阳县，北与三原县毗连，南跨渭河与灞桥、未央区接壤。县城面积不大，东西长 20 公里，南北宽 19.6 公里，总面积约 294 平方公里。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却是全国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自虞夏已为名地，大禹导水，泾属渭涘，绕于县南。”^[7]其县城名称也是历史悠久，一种说法认为“灞水之至高陵而益大，每遇泛涨，弥漫十余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虽且崩数年，不过一二丈，故县曰高陵。”^[8]另一种说法认为“县南有奉政原，高四五丈，高陵之名由是昉也。”^[9]以后各朝，县名又有所改动，如“千春”、“高陆”等名称，“至隋时复改为高陵”，才相沿下来。

高陵由于位于关中腹地，地势平坦，泾水和渭水两条河流流经，加上当地气候适宜，雨水充沛，所以土地肥沃，自古便有“黄壤陆海”的称号，今天更是被誉为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足可看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历史上，高陵地区的人口因为社会的动乱、水利的兴修或废弃、自然灾害的多寡、封建政权剥削的重与轻以及疾病的流行等众多外部原因，人口的数量变化不定。至晚清民国时期，更是因为频繁的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人口大量的迁入与迁出，所以晚清民国时期的人口也是起伏较大、变化不定。最多时达到 6 万多，而最少时不到 3 万人。而人口组成成分主要以汉族为主，仅有极少量的满、蒙、回、维、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人口，可以说人口比较单一。在教育方面，自古以来便十分卓著。由于建制早，所以在教育方面历史悠久，秦汉时便有官学，同时民间也设有序庠。以后历代的教育体制更加完备，设有“书院、儒学、社学、义学、私塾”等众多教育机构。^[10]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便渐渐转入以传授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近现代教育。但是从整体来讲，整个地区的教育落后，民国时全县除小学外，仅有一所中学，加上人们生活非常贫困，青少年不能就学，群众总体文化水平低下。

位于高陵西北方向的通远坊（当地称通远镇）是天主教较为集中的地方。这个镇包

^[7] 吕楠. 明. 高陵县志[G]. 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刊行. 35

^[8] 吕楠. 明. 高陵县志[G]. 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刊行. 38

^[9] 程维雍. 清. 修. 白遇道. 清. 纂. 高陵县续志[G]. 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56

^[10]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0: 7

括 10 个村落，总人口约 25000 人，是高陵辖内三个建制镇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村落。在镇中心街上坐落着一座明代宏治年间所建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就是远近闻名的关中和三原教区的中心。

2.2 天主教在当地的基本情况

天主教传入高陵之前，当地一直都有少量的宗教活动，包括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其中道教和佛教作为本土宗教流传时间较为久远，但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渐渐的衰落了。



图 1 通远教堂外部

至 1928 年时，全县仅有道上 5 人，道姑 7 人，并且大多四处远游，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而佛教在 1928 年全县也仅有 272 人。至于伊斯兰教，在 1862 年回民起义后，遭到清军镇压，迫使全县回民离家西迁，伊斯兰教随之在此地消亡。^[11]当地宗教信仰的单一和其他宗教的逐渐衰落为天主教的立足及以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再加上，高陵一地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地处偏僻，对于晚清还未完全解禁的天主教来说，地理位置上的偏远保证其传教工作的顺利展开。而且当地教育比较落后，所以当地群众整体上文化水平较低，但是

民风纯朴，人口组成上比较单一，所以对于外来事物并没有强烈的排外心理。元朝时，有方济各会^[12]士来此传教，很快便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此后明朝时更有耶稣会^[13]士方德望等人在此传教。清康熙年间，有富平天主教徒魏良栋后裔及一户姓康的教民先后迁来高陵刘家堡，成为此地最早的天主教徒。而刘家堡也在当时被来此的西方教士改为通远坊，意即“通向远方”^[14]。但是至康熙时期，因“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止传播，

^[11]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69-673

^[12] 方济各会，天主教修会之一，为意大利人方济各所创立，教宗不但认可并给以特权保护。此会发展迅速，势力庞大，在天主教中占据重要位置，陕西地区的天主教主要被这个教派掌握。

^[13]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由西班牙人洛约拉于 1534 年创立，1958 年经教宗保禄三世正式认可。但最终因牵涉政治活动于 1773 年被罗马教宗取消。明朝时传入我国的天主教大多为该会。

^[14] 宗怀德. 三原教区主教. 访谈时间: 2009 年 8 月 15 日. 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当地的西籍教士被遣送回国，原教堂也被拆毁或改作它用。^[15]此后，虽然仍有教士来此传教，但入教的人数仍然寥寥无几，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基本上是处于地下状态。至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正式传教权利，天主教势力也因陕西第一任主教冯尚仁建总堂于通远地区而逐渐兴盛起来。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高陵一地成为西北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并随着教区的变化成为陕西中境教区的中心、三原教区活动中心，其历史悠久、发展规模大、影响大，是当地天主教徒的圣地，历任主教都常驻通远，统管整个教区的大小事物。外国传教士来陕西也都居住在通远坊，与外国人通信，其地址就写“中国通远”，由此可见通远天主教影响之大。

自从天主教在当地开始传教活动，在此的历任主教都大力发展教会势力，修建各种

设施，扩大教堂的规模，尤其是在天主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如高一志、林寄爰、胡定邦等人任主教期间，都曾经大肆修建教堂，购买土地、发展势力。高陵境内的天主教堂6处，大都修建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些教堂括通远坊天主教堂、张白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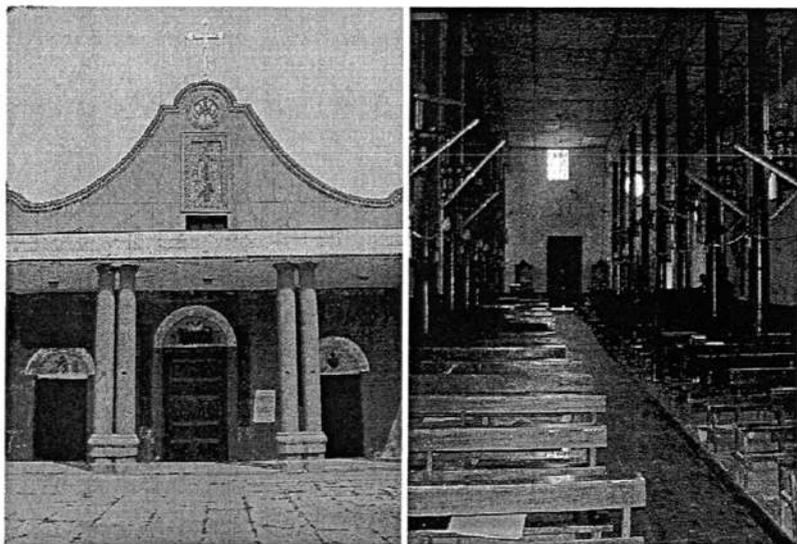


图2 通远教堂内部

主教堂、郭路村天主教堂、岳华村天主教堂、北仁村天主教堂、蜜蜂王村天主教堂。而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属通远坊天主教堂。

以通远坊为中心的高陵天主教教产，原有的各种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就达到340亩，主要建筑的占地面积达123亩，其中包括主教公署的三层大楼、修道院、修女院、医院、光华小学、邮政代办所、气象站、地震站、发电站等机构，被誉为“东方小罗马”，但是其中许多建筑或设施由于诸多原因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在当地保存的大量天主教建筑中，包括主教堂一座、保赤会（孤儿院、育婴堂）、圣母会大楼、神哲学院等建筑。

^[15]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93

其中主教堂自 1844 年修建，至 1848 年竣工，1857 年又进行了再次的修建，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仍保存完好，并一直使用。教堂占地面积约 65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2000 人；其结构为古罗马式砖木结构，青瓦盖顶，里面两排大红漆柱作为顶木支撑堂面，堂面造型美观。^[16]大堂的里面两侧各有一个耳房，并挂有走廊。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在两侧墙壁上的墓碑。原来临任主教死后都埋葬在教堂内，而不修坟塚，地面依然平整，只是将墓碑表于墙壁上，墓碑上使用中西两种文字记录其生平。迄今，教堂内已埋葬了主教、副主教共 9 位，包括陕西副主教郭德礼、何阿多利各理熙主教、林雅玛笃奇爱主教、西安教区戴夏德主教、主教方启升、雅尔风徐冯尚任主教、高爱斐削高一志主教等人，每年的 11 月 2 日，会举行大瞻礼，以此来祭奠亡灵。

除了通远坊的建筑外，其它教堂也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张白村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 1902 年。修建之初比较简单，只有简易堂三间。建国后于 1954 年重新修建堂七间。郭路村天主堂修建于清宣统元年，即 1909 年；北仁村天主堂建于 1921 年，至 1932 年又再次修建；其它两座都修建于建国初期。

天主教在百年的时间里，就能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在当地及陕西甚至世界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这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特有的国情是分不开的，其发展壮大有着深厚的历史及现实原因。首先，在历史上，陕西便是天主教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活动区域，而高陵一地在元朝、明朝和清朝初期便有天主教传教士活动，并发展了大量的教民，所以此地具有较好的宗教信仰基础。虽然清朝康熙时期，由于禁教使得当地外国传教士被驱逐，教民几乎丧失殆尽，宗教活动也深受打击，几乎消亡，但是仍有一些传教士在教民的掩护下躲藏起来，进行秘密的传教活动，成为天主教再次兴起的有力因素。其次，由于晚清民国时期，陕西地区战乱和灾荒频繁的现实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苦，为寻求生活和思想上的支撑和依靠，在天主教宣扬的入教便可有饭吃、有衣穿、死后即可进入天堂等一系列的美好愿望中，众多百姓便纷纷入教，以期在天主教的信仰中寻求现实中不可能的理想。再加上当地宗教信仰的单一及其他中国本土宗教的衰落，都为天主教在当地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而天主教也在外国势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抓住有利时机，不仅顺利的再次传入当地，并在晚清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6] 据高陵文物管理委员会 2007 年 8 月 10 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资料。

第三章 19 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

3.1 天主教早期情况

早在元朝时,天主教士便曾到此地进行传教。1328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何理德奉北京主教约翰·盈德高维诺之命来陕西三原、高陵一带传教,当时拥有教徒千余人。^[17]1630年,德国传教士方德望和郭依纳德来陕西传教,并监管全省教务。他们主要活动在三原、富平、高陵一带,三个地区拥有教民总人数达20000多人。之后由于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受打击,教民几乎丧失殆尽。1668年,有富平天主教徒魏良栋的后人及一户康姓教民迁来高陵刘家堡一地,并发展当地刘姓、李姓、王姓、吕姓、韩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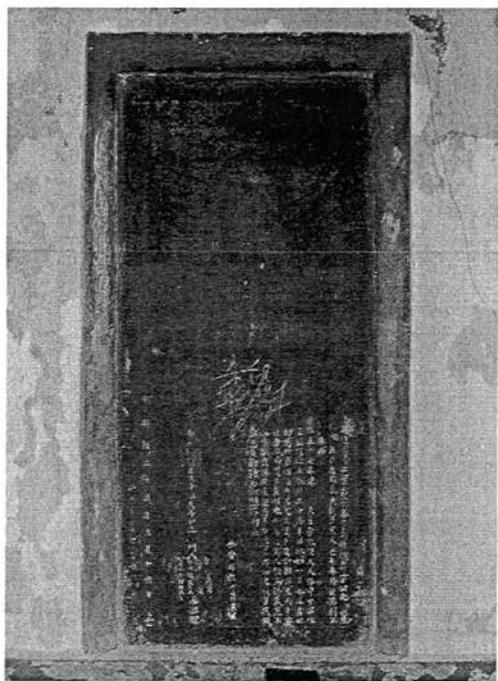


图3 方启升墓碑

五姓中的人入教,^[18]使得高陵天主教得以延续,并逐渐发展,从而开始了此地长达320年的天主教历史。而原来只是一片荒地的高刘家在此后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在此后被当时的外国教士改名为“通远坊”,意思是“通向远方”,而这里的远方指的是远在地球另一方罗马教廷;另一种含义为通向天堂这个遥远的地方。

康熙八年,即1669年,天主教会和教民因为中国教民祭祀祖先和祭拜孔子的问题而发生矛盾,由此引发天主教历史上著名“中国礼仪之争”。其实,早在天主教传入的早期便出现过这个问题。天主教传入的早期困难

重重,由于中国人民固有的儒家思想,所以早期传教活动并不顺利。到利玛窦时期,为了便于天主教的传播,利玛窦改变传教策略,不再反对中国人民的固有传统道德习惯,并认为中国人民“敬孔”、“祭祖”同天主教中的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而且他将天主教的信仰对象——“天主”说成中国人民所尊崇的儒家思想中的上帝,由此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康熙很是赞赏,称其为“利玛窦规矩”。也正是因此,利玛窦及其之后的时

^[17]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74

^[18]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74

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1669年开始的“礼仪之争”却完全抛弃了利玛窦开创的良好局面。尤其是方济各会宣扬对耶稣基督的一神信仰，反对中国固有的“尊孔”、“祭祖”传统道德思想。1704年，教皇正式禁止中国教徒祭祀祖先和祭拜孔子，否则将会采取严厉的惩罚——“绝罚”^[19]政策。康熙帝随之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由此开始了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禁教”事件。天主教在康熙时期被下令禁止传播，以后历任的清朝皇帝也都采取这一措施，并且愈加严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后才逐渐缓和。所谓的“礼仪之争”表面上看主要内容围绕中国教徒是否能够祭祖和祭拜孔子等问题发生，但是，实质上体现出罗马教宗试图控制中国教民的思想，如此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到清政府政权，所以康熙帝及其后继者都严厉禁止天主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在传播策略上的局限性。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只是采取强硬手段，致使同中国固有观念和习俗相违背，最终被禁教将近两百年，极大的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从此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被完全禁止，天主教教士或被杀或被驱逐出境，教徒也几乎丧失殆尽，侥幸存留下来的也被迫转入地下，这一情况也反映在陕西的传教活动中。在百年禁教期间，陕西的宗教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并且在选择传教地点是也大都建在远离城市、较为偏远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因此为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711年，当时任陕晋代牧主教方启升开始在通远购买土地，建立起一座拥有7间房屋的砖木结构的教堂，并在此发展教民数百人。^[21]这可以说是高陵发展天主教的起始点，也是高陵通远一地成为西北天主教活动中心的开始。

3.2 传教基地的建立：

十九世纪40年代的中国，西方侵略者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为外国宗教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朝对于天主教的百年禁教开始解禁，虽然在《南京条约》第13条中只涉及对传教者的保护，但这对于天主教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讯号。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条约中明确规定可在通商口岸设立礼拜堂。之后，在以拉萼尼为首的法国使团的威逼利诱之下，耆英的关于结束对天主教的实行的百

^[19] 天主教会给予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分，受处分者死后不能升天，并且受罚者生前无人愿意同其来往。是天主教会内极为严厉的处罚手段。

^[20]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40

^[21] 宗怀德. 三原教区主教. 采访时间: 2009年8月15日. 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年禁教政策得到了道光皇帝批准。从此，结束了天主教的百年禁教。而伴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逐渐解禁，陕西高陵地区天主教也正式从这一时期冯尚任成为主教开始传播发展的。并且，随着发展规模及影响的扩大，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逐渐成为天主教在西北地区的总堂和西北地区天主教活动中心。

冯尚任(Alfonso Donato), 讳雅尔风徐，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近代陕西天主教教区第一任主教。但是最初他来到中国时，却是在山西地区传教。1844 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外部传教环境的改善，传教活动急需大力展开，罗马教廷随之将陕晋两省划分为两个教区，冯尚任被罗马教廷正式任命为陕西省主教，兼管甘肃教务（1845 年—1848 年）。第二年，冯尚任即由晋到陕，负责陕甘教务。此时的陕西天主教，虽然有不



图 4 冯尚任墓碑

平等条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天主教在内地的传教活动仍是被禁止的，所以从康熙时期开始的禁教政策仍继续实行，晚清政府对宗教活动仍然严格控制，天主教活动仍处于地下状态。此时的传教中心已经由西安转移到关中东部渭南一带，但此地偏处一隅，距离省会城市较远，教会发展很不便利。冯尚任到任后决定另外选择地方建立总堂，考虑到此时天主教在内地的活动还未解禁，所以不能将总堂设在繁华的地方，否则容易引人注目；但是也不能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否则不利于教会的发展。最终，在高陵县郭路家村教友的极力劝说之下，决定将总堂设

于距离西安一百多公里、既非省城、又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高陵通远坊地区。因“该地既不通大路，与通都大邑亦较远，易于避人耳目，便于举行宗教活动。同时，郭路家的教友精于武艺者多，在宗教及其他活动方面若发生事情，还能从中搭救。”^[22]

伴随着传教中心在当地的建立，高陵天主教活动也由此时正式在高陵一地发展起来。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教民人数增多、教内事务也逐渐增加，随之要求大量的传教

^[22]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5

人员。在此之前的传教人员大多依靠罗马教廷派遣的外籍传教士，这已经无法满足当地的传教活动的需要了。而且，天主教人士也逐渐认识到，天主教要在中国生存并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中国下层的普通百姓，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吸收大量的中国教民成为教士来宣传教义。为此，冯尚任任主教期间，有意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人员，一方面满足管理教会内部事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了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大潮流。于是，冯尚任时期，在通远坊地区建立主教府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所男修道院，以便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他本人亲自任教，并编写了拉丁语课本。^[23]这所修道院在以后当地天主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大量的神父，例如据现存于通远教堂内的墓碑碑文记载，有司铎王济方即从此肄业，之后在高陵、临潼、咸阳、蓝田、长安等地传教。^[24]鉴于修道院在教会中的重要性，所以院长一职大多由有主教担任，因此以后的许多主教都曾担任修道院的院长。至1905年时，这所修道院还有修生19人。

冯尚任因病逝世于1848年，时年四十四岁，他的坟墓及墓碑至今仍在通远教堂内。在他的墓碑碑文简单的记述了他的一生：

泰西圣方济各会鉴牧，冯公，讳雅尔风徐。道光己巳由晋来秦，分设学堂。意极草创，尚未大备，越戊申，积劳而薨，寿四十有四。

虽然冯尚任任主教仅仅三年，但他却开启了天主教在西北地区传教活动的新的历史，将陕西天主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之后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发展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奠定了天主教在高陵通远地区的发展基础。自从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其传教方式主要注重吸引中国上层人士的入教，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采取的传教策略便是结交当时的朝廷重臣，并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历史上，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不但注重取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并且也在下层百姓中的传播，因此康熙帝禁教之前陕西的天主教蓬勃发展，教徒人数达到6万余人，是当时教徒人数最多的省份。康熙禁教使陕西传教事业受到严重打击，教徒丧失殆尽，传教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这也迫使天主教教会转变传教方式的侧重点，转而将下层百姓作为传教活动重点。而冯尚任建总堂于高陵一地的做法也正是符合了天主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教策略，也使得遭受百年禁教打击后的陕西天主教获得了又一次重新发展的良好时机。冯尚任时期能够如此顺利的在高陵地区建立传教基地，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而宗教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也随之扩张。坚船利炮打开了

^[23] 宗怀德. 三原教区主教. 采访时间: 2009年8月20日. 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24] 董柱国. 高陵碑石[M]. 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三秦出版社. 1993: 320

中国的国门，也为十字架的传播铺平道路。加上 1844 年《望厦条约》及后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晚清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百年禁教。冯尚任便是充分的利用这时期的有力条件开始为天主教在陕西的恢复和发展做好了准备。虽然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内地对于天主教的活动还未完全解禁，冯尚任不得不将传教中心建于高陵一地，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为以后陕西天主教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陵一地也由此时起开始成为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教中心，正如后人评价“天主教总堂在西安土地庙街……天主教的根本势力，则在高陵之通远坊，其地几与租界无异。”^[25]

3.3 回民起义中的发展

冯尚任去世后，高一志接任陕西主教，为陕西教区第二任主教。高一志（Ephisius Chiais），意大利人，1834 年来到中国，最初传教于山西，1835 年来到陕西。冯尚任去世前就被委任为主教继任者，并在 1847 年被祝圣为主教，冯尚任去世后即接任主教职位。高一志自 1849 年任主教起，至 1884 年去世，历时三十五年，是历任主教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在他任职期间，高陵地区天主教以至这个陕西地区天主教都获得了相当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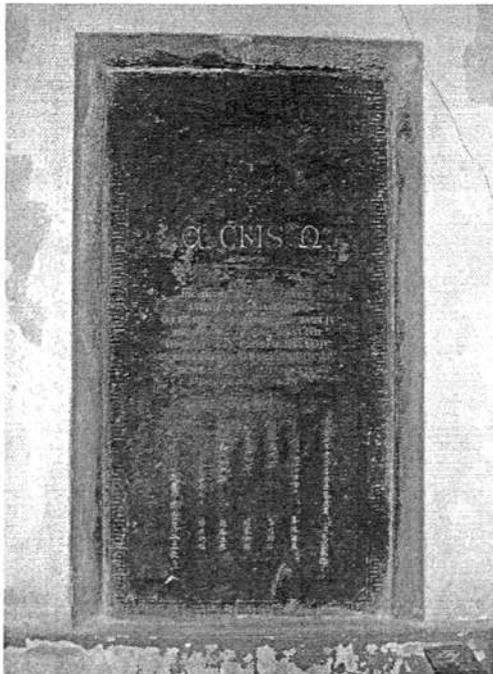


图 5 高一志墓碑

1858 年《天津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使得外国宗教传教权从通商口岸延伸到内地，天主教取得在内地公开传教的自由，并从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传播开来。由此，陕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逐渐转为公开，随之高陵天主教也蓬勃的发展起来，体现在教堂建筑发面大力修建、在教民人数上也迅速上升。

首先，高一志大力扩展了通远坊，扩充冯尚任时所建造的神学院和主教府，并于 1857 年修建通远坊大教堂。^[26]新教堂宽 14 米，长约 46 米，占地面积 1166 平方米，是一座主体为哥特式的中西合璧二层建筑，可容

^[25]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5

^[26]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6

纳 2000 人同时“礼拜”，同时也是当时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教堂，号称天主教西北总堂。^[27]而扩建的神学院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中国籍传教士约 12 人。这些传教士主要活动在三原、周至、户县、岐县、渭南、临潼等地及山西和甘肃等省，其传教时间长达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大大扩展了天主教在关中及整个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从 1836 年至 1861 年，到陕西进行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也近十人。高陵天主教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陕西以至西北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基地。

高一志任主教期间经历了回民起义及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因为在当地时间短暂，并未造成较大破坏，所以影响不大。而回民起义却成为当地天主教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契机，由于主教高一志策略得当，使得天主教教民数量得到迅速发展。

1862 年，陕西爆发回民起义。同年五月十四日，起义军“陷渭北之高陵、三原等地”，然而，对于所攻陷的城镇“皆弃而不守，饱掠归巢”。^[28]陕西的天主教力量在起义最初也遭受极大地损失，高陵县城也未能幸免，起义军经过后，县内清查户口“县户绝者四千二十有八，男女死亡者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一，唯通远坊一村无恙。”^[29]原来当回民军队进入高陵通远坊时，高一志和回军首领进行交涉，“说大家同是‘主’的信徒，从而彼此成约，互不相扰，”^[30]并且还往来密切，关系融洽，所以“回军不但不加害教民，反而特别保护并帮助教民，甚至赠送教民物品。”^[31]因此许多非教民为了自身安全，本着“依教”“靠教”的出发点，也纷纷申请加入天主教，全省教民数量猛增至两万多人。其它各处也对这一事件有大量的记载：如“同治元年回变作，邑人者多归附于天主教，得偷生焉。迨多忠勇、左文襄公统兵西麾，扫清关陕，回种亡，天主教盛。”^[32]回民起义失败了，但在此期间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却大多因为惧怕起义再次发生而不敢贸然退教，所以教民人数在此期间不但大幅增长，而且非常稳定。

1878 年，陕西发生饥荒。高一志以天主教教会的名义进行赈灾，在高陵地区施放粥饭。高一志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天主教的救助灾民的意愿，而另一方面却也是要以此作为吸收教徒、发展教会力量的一种手段，他规定：凡是想要吃到教会粮食的非教徒，必须先立下誓言入教，并且入教后不再退教。这就是所谓的“吃教”。这种做法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使教徒人数大量增加。由此，在高一志时期，高陵天主教徒的数量

^[27]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市志. 西安出版社[G]. 2006: 93

^[28] 中国史学会主编. 回民起义[G]. 神州国光社. 1953. 4: 219

^[29] 程维雍. 清. 修. 白遇道. 清. 纂. 高陵县续志[G]. 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367

^[30] 高陵文史委员会编. 高陵文史资料[G]. 2004. 14: 184

^[31]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 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6

^[32] 据张元际（清）纂修. 光绪三十二年抄本影印. 兴平县乡土志[G].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74

达到了 700 多人，较之前的数量可以说是大大增加了。但同时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于高一志发展教徒心情过于迫切，不太注重教民的素质而只是一味的追求数量，所以在吸收教徒时“不问贤愚，盖准其习教，”因此，县内“流寓之民与齐民有夙愿者，往往藉入教以竞胜”。而且，许多人认为，一旦入教后，“尚奉县官约束，唯谨不敢少违异”，实在是“迫于势之不得已”而入教。^[33]这种做法影响了教民的整体素质，使得天主教在当地的影响受损。

从高一志时期高陵天主教的发展可以看出，天主教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地区的战乱和灾害有着重要的关系。百姓为躲避战乱而入教，为在灾荒中获得教会的粮食存活下去而入教；天主教则利用战乱灾害和教会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力宣扬教会的宗教信仰，宣称教会的仁慈帮助都是因为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救济众生，以此吸引或者强迫群众入教，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靠教”“吃教”现象。在这一时期，高陵一地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导致当地人口从 1861 年的 5 万多人锐减到不足 3 万^[34]，而天主教却在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不得不说是因为群众的“靠教”“吃教”行为，天主教的这种传播手段是其在晚清民国时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方启升至高一志这三位主教任职期间，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是高陵天主教发展起步阶段。天主教在经历近两百年的严酷打击之后，重新获得了在中国发展的机会。从高陵天主教发展的过程来看，天主教寻找到了一个在当时中国发展的较好的方法，那就是扎根于偏远地区，保存力量，以图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具体的情况也审时度势，保持和各派力量的良好关系。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回民起义后的第四年，即 1866 年，陕西巡抚乔松年在西安府于高一志议立保护教士条款四条，并咨呈总署备案。^[35]由此，更是为陕西天主教在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方启升开启了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历史，冯尚任奠定了通远坊天主教传教地位，而高一志则开始了高陵通远坊真正意义上的传教中心的地位，并将高陵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使得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期，也为以后整个西安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3] 高陵文史委员会编. 高陵文史资料[G]. 2004. 14: 185

[34]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15

[35]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380

第四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持续大发展

4.1 林奇爱时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陕西正处于多事之秋，高陵地区更是灾难不断，不仅出现多次的灾荒，并且伴随着多次的战乱。据资料记载，从 1877 年开始至 1910 年的 30 年间便发生旱灾和水灾达 13 次之多^[36]，同时又发生了回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连续的危害和战乱对当地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人口大量减少。但是，天主教的发展却未受到影响，相反，在这一时期却有较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继《南京条约》之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为外国宗教在内地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几位主教充分利用了天灾人祸等时机，大力吸引群众入教的原因。



图 6 保赤会遗址

首先，继高一志之后为主教的是林奇爱。林雅玛笃 (Amatus Pognucc)，讳奇爱，意大利人。1864 年来到中国进行传教，第二年来到陕西，越二年升为副主教，^[37]协助高一志处理教内事务，高一志去世后继任，为陕西教区第三任主教。在他担任主教时期天主教继续发展。

林奇爱担任主教时期再次扩充了高陵通远坊的大教堂，新建通远坊主教府三层大楼，但在 1954 年，由于基础不牢全部拆去；同时，在 1884 年，通过法国公使与清廷交涉，收回了西安天主教南堂，并在 1892 年扩建，使之成为西安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天主堂。^[38]而这座天主堂也成为以后西安总堂的最初模型。

1887 年，陕西发生大旱，灾情严重，大量饥民流离失所。当时还担任副主教的林奇爱协同高一志主教赈济灾民，并利用这一机会组织饥民修筑通远坊城墙南城。林奇爱继任主教继任之后，继续修建了北城，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通远坊城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教会财产，并便于传教事务的进行。城垣在以后由于年久失修，同时也因为失去

^[36]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89-92

^[37] 此处根据教堂内所存林奇爱墓碑的碑文。

^[38]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市志[G]. 西安出版社, 2006: 92

了基本保护功能最终渐渐消失。

天主教传教方式除了发生在灾荒和战乱时吸引群众入教外，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便是大力兴办慈善事业和采取以医药布道的传教策略。1886 年，林奇爱从“欧洲招了一批方济各圣母传教会修女，在妇女中进行传教活动，并兼办孤儿养老事务。”^[39]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简称为“圣母会”，俗称“白会”，因为这个修会的修女服装为白色所以有此称法。圣母会属于国际性的修会团体，本名圣方济各圣母传教会，又名圣母圣心会。初创于法国，1884 年传入中国。^[40]林奇爱时期六位法国修女从马赛经过六个多月的旅程，来到高陵，自此圣母会传入陕西，之后由高陵一地有传入其他地区。如 1899 年，圣母圣心会传入三原，在油坊道购地建修女院，意大利人若忍娜任院长。^[41]为此，在通远坊内修建了一座修女楼。在以后的发展中，她们又办起了慈善事业——保赤会，会内包括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和医院。其中，医院有“外国西医 5 名，院长为意大利人玛利亚·若翰纳。医院一直持续到 1948 年，之后外国医生陆续回国，遂自行解体。”^[42]这也是高陵最早的西医，慈善医院的开办为当地的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天主教在当地树立良好的形象发挥了极大作用。伴随教务的发展，教会为保赤会修建了占地约 30 亩、拥有四五十个房间的长房和一座拥有八九十间房屋的双层转角楼。

到此时，高陵天主教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机构：教堂外筑有高大的城垣，城内教堂高耸，楼房林立，包括一座三层高的主教大楼、一所占地 20 多亩神学院、一座修女楼、一所专供教外人士学习的“保禄学校”、一所医院，以及保赤会、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

在教务上，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活动在内地的合法化，陕西的宗教活动已经完全公开进行，并得到慈禧的谕令和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大力保护。1899 年正值义和团运动的前夕，各地纷纷掀起了反洋教运动，据当时陕西巡抚魏光燾的奏折，以陈鹏、刘云灿等人为首约定在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打毁高陵天主教堂，但最终事情泄露，被全数抓获，^[43]高陵天主教免于劫，但从此事也可印证当时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大力保护；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天主教在全国各地受到打击，但西安地区由于慈禧太后下谕派

^[39]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8

^[40]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市志[G]. 西安出版社. 2006: 95

^[41]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 三原县志[G].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981

^[42]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01

^[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清末教案[G]. 1998: 815

兵保护教堂，及神学院毕业生曾义宏的大力传教，”^[44]教民人数这一时期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高陵天主教势力也随着陕西天主教力量的发展也大大增加。

随着教会的发展，教内事务日益繁杂，仅由林奇爱一人管理全境宗教事务已力不从心，所以 1887 年划分汉中教区。但由于失误，却出现了差错。原来林奇爱划分汉中教区“本为扩张方济各会之势力，曾致函罗马方济各会总会长，要求该会会士来陕西接管陕南教务。”^[45]但委派何人为陕南教区的主教必须经罗马传信部^[46]批准，所以林奇爱在寄给罗马方济各会会长的信中又另外写给传信部一封呈文，其意图是希望方济各会会长事先有所准备，能从中斡旋，争取陕南教区的教权，最终却阴差阳错，罗马方济各会会长接到信后，发现有传信部的呈文，未及看信，先将呈文转上，等到看信后方才知道林奇爱的意图，后悔不已。之后传信部将汉中教区于 1887 年交给另一个教会管理。这成为以后教内纷争的隐患。

总之，林奇爱时期高陵天主教进一步的发展，通远坊也从过去的一个蛮荒地变为人口稠密的城镇，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名副其实、远近闻名的天主教传播中心，因而被誉为“东方小罗马”。据说，外国人邮寄到此地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通远坊”即可，^[47]由此可见教会当时此地的影响力。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安定的因素，教会内为争夺教权明争暗斗，即使是同属方济各会的教士也是如此，同时又因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不同，其争斗更是互不相让，这种情况在以后逐渐的暴露出来并进一步的恶化，给整个教区的发展带来不利。

林奇爱逝世于 1901 年，至今高陵天主教堂内仍完好保存期墓碑，碑文记述其一生：

泰西圣方济各会士，陕西第三任主教，欧洲意国人，生于一八三三年，自幼弃俗入院精修。行年三十一，报道来华，越二秋升副主教，寻赴罗马参梵蒂冈公会议。无何继任高公正大位，充中国第二区议会会长。推广堂宇，修保赤会、省垣，高陵建筑一新。性慈善，济困扶颠，阖属爱戴，有口皆碑。适庚子难作，竭力维持，继遭荒疫，心神俱碎，一病长逝，时一千九百一年，在位三十四载，享年六十有八。

4.2 何理熙和胡定邦时期的教内纷争

何阿多利各(Odorico Giuseppe Rizz), 讳理熙，意大利人，陕西教区第四任主教。

^[44]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市志[G]. 西安出版社. 2006: 92

^[45]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9

^[46] 罗马教廷行政管理机构之一，17 世纪 20 年代成立，全称“宣传信德部”。主要职能是指挥全球的传教工作及传教士的合作，专门负责培养传教士和派遣传教士。中国教区隶属传信部管理。

^[47] 宗怀德. 三原教区主教. 采访时间：2009 年 8 月 20 日. 采访地点：高陵通远

在其任职期间，陕西方济各会传教士尔倾我轧、互相排挤的情况日甚一日，当何理熙逝世之时，明争暗斗的现象已呈表面化，何理熙得病之后很快死亡也与此有关。

何理熙来陕西之后主要传教于周至、户县和岐山等地。1902 年被委任为陕西北境主教，但是他的委任状到达陕西后被劫，所以未能及时就任。之后被二次委任，才正式接任主教一职。但他在任只有两年多便去世，“据传：何理熙的委任状被德国方济各会教士在渭河中途劫走。则何理熙逝世之速，原因明显矣。”^[48]另一原因，也是由于何理熙外出巡视教务，在途中冒雪生病有关，回至高陵医治无效而死。^[49]虽然，何理熙的死亡与教内纷争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从委任状被劫一事可以看出此时教内纷争已趋激烈。争斗双方虽然都属于方济各会，但由于国籍不同，利益也就有所不同，从这点也可反映出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争夺。

当时，陕西各地除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之外，还有英、法、德及西班牙等国的方济各会士，而以往主教都为意大利人。随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争斗日益的激烈，陕西教区不同国籍的天主教教士也开始了教会内部权力之争，高陵一地作为陕西天主教的中心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这引起了远在罗马的方济各总会的注意。为缓和争端，方济各会总会长在何理熙死后，向罗马传信部推荐德国人胡定邦继任主教职位。这种方法虽然暂时缓和了矛盾，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相反，却助长了德国方济各会士的气焰。

胡定邦 (Alanasio Goethe)，德国人。于 1905 年 1 月 30 日在德国被“祝圣”^[50]，至第二年回高陵正式接任主教职位。他到高陵就职时，大放烟火，以示庆祝，并限制进入通远城内观看的人数，致使未能进入的人踩踏当时将要成熟的棉田麦地，造成很大损失，也激起了民怨；另外，他与其弟倚仗财势，欺压百姓，使用蛮横手段扩张声势，造成恶劣的影响。天主教教规中，不允许教民吸食和种植鸦片，教规本来是劝诫教民规范个人行为，但是胡定邦却借由这一教规，与其弟强行捣毁一户教友家种植的鸦片，因此其弟被痛打几乎丧命。天主教本为在教民中实行天主教教规，劝导教民禁种鸦片，但是由于胡氏兄弟的粗暴做法，反而激起了教民强烈的反抗，削弱教会在教民中的影响力。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法战争激烈，教会内也分成德国和法国两派互相争斗。当时，陕西教会中，“德籍教士以胡定邦其弟为一派，法籍以穆斯理（时任副主

^[48]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23

^[49] 此处根据教堂内所存何理熙墓碑碑文。

^[50] 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认为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照特定仪式，诵念规定经文，可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在高陵逐渐发展成为，若主教未经祝圣，那就是未经梵蒂冈教廷授予主教职位，便不是真正的主教。

教，也是继胡定邦之后的主教)为首，两派互相谩骂，以至不共进餐……当时混乱现象，实为陕西开教以来所未有。”^[51]在他死后仍被人痛恨，而他造成的影响在以后长时期都未能消除，甚至愈演愈烈。

胡定邦任职期间，教内纷争不断，但是天主教势力却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修建新教堂，如郭路村天主堂便是在他任职间 1909 年修建的；第二，在他任职期间，教会在经济上比较富裕，所以能够顺利的展开各项活动。高陵教堂资金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教民捐款和神父们到社会上的募捐；二是向梵蒂冈传信部的申请；但是由于民国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所以教民的捐赠是极其有限的，而来自传信部的款项也是朝不保夕的，所以，高陵当地天主教的经费一直都是非常拮据。但是，在胡定邦任主教期间却相当的富裕。原来，胡定邦有弟弟在美国经商，并且其亲友对于他也大加帮助；同时，胡定邦本人还曾亲赴美国进行筹款，所以其一生钱财富裕，豪华奢侈，甚至有人说，他的死亡是因为钱财而被基督教人暗害。^[52]

从何理熙开始至胡定邦时期是陕西天主教自解禁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教内纷争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由于个别主教的个人因素而导致的。表面上看教内的纷争是天主教内不同派别的争斗，但究其实质，在各个派别的背后其实是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各派别所代表的是各帝国主义的利益，从而反映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激烈争夺。旧中国的外国宗教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外国宗教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很大原因上也是因为教会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各个不同教派为了自身的发展对帝国主义也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又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形成了外国宗教在华传播的独有特点。而陕西高陵地区天主教同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天主教因为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获得了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天主教的传播，但同时也带来许多的不利因素。由于教会内部教士来源于不同的国家，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这些教士能够在教会内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权益也是因为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为了维护自己在教会内的权益，他们也就不得不维护支持自己的各个帝国主义的权益，这也是教会内教士们争斗的实质。外国教士的争斗势必给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

^[51]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24

^[52]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24

危害，他们的争斗也势必会以牺牲中国教士和教民的利益为最终结果，所以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有中国人民来掌握宗教大权，并管理教区内的事务，宗教活动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中国的宗教中国人自己掌握，只有这样，宗教才能健康顺利的发展。

4.3 穆斯理时期的内外交困

胡定邦任职期间教内纷争已经相当激烈，但是范围较小，也仅仅存在于个别教士当中；但是至穆斯理时期争斗逐渐升级，并扩展到整个教区，这些争端又恰恰是由穆斯理主教挑起。同时，这一时期高陵天主教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教会外部的诸多威胁。

胡定邦逝世后，在高陵通远坊的七位西班牙传教士一致签名要求罗马委任副主教穆斯理为正主教。但是许多人认为穆斯理不足以担当这一职位。因为“其品行不良，道德败坏”，^[53]以至在湖北神学院时被险些开除。之后他跟随两位法国传教士到陕西，被林奇爱主教收留，直至被委任为继胡定邦之后的新任主教。七位法国传教士联合签署要求委任穆斯理为新任主教，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排挤教内的意大利教士的势力，而穆斯理的继任也宣告了意大利教士在教会内优势地位的失去。

穆斯理(Gabriel Maurice),法国人。他上任后，继续实行排挤意大利教士的政策，并运用各种手段迫使意大利教士自动离开陕西；除此之外，当时英、法、美和西班牙诸国的方济各会士日渐增多，彼此之间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斗争的中心为法国和西班牙教士之间。1911年，陕西延安由关中道分出另设主教区，主教为西班牙人易兴华。^[54]但是，穆斯理却多方阻挠易兴华上任，以泄私愤。如易兴华升任主教后，由高陵通远坊上任，穆斯理在他住的房间放上饲养牲口的饲料，对其侮辱；等到易兴华行到铜川之后，又派人将他从高陵通远坊带走的祭品全部追回。^[55]由以上事件可以看出此时教会内争斗的激烈，而穆斯理骄纵蛮横的态度更是引起教会内外的一致反对，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事情最终导致其辞职。

辛亥革命革命时期，有渭南的教友因为分家产而引起争端。穆斯理强迫当地神父党伯禄进行排解，而这一做法干涉了教友的家庭事务，引起教友家人的愤恨，最终党神父

^[53]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25

^[54] 高陵文史委员会编. 高陵文史资料[G]. 183

^[55]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25

被诬告而杀。穆斯理知道后大怒，决意报复。因此，他来到北京参见法国公使，要求出兵，但因其态度蛮横而被拒绝。但此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罗马教宗也因此密切关注陕西地区教务发展情况。在外部，天主教会面临来自当地武装部队的威胁。原来，穆斯理自上任以来，由于其蛮横无理，同地方积怨颇深，所以担心军队袭击通远教堂。1910年，穆斯理因为惧怕革命军队张凤翔袭击高陵通远坊，武装神父、修生和教友，自任统帅，每日朝夕操练，气势森严，在当地引起恐慌；1914年，由于教区经济拮据，穆斯理亲赴欧洲筹款。趁此机会，罗马教廷委派山西太原主教凤朝端来高陵视察教务，实际是为了处理穆斯理和西班牙教士历年来的争端，穆斯理不得已向罗马教廷提出辞职。

从主教职位之争中法国意大利教士的矛盾到后来的法国西班牙教士的矛盾来看，这时的教会内部争斗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外部面临的地方武装部队的威胁，使得当地的天主教发展步履维艰，穆斯理的辞职真正的原因在于历年来的教内教外的矛盾和纷争严重影响了教会的发展；同时，穆斯理任主教期间，表面上看此时教会顺利发展，声势浩大，但其实已是外强中干，在经济上已远不如前两任主教，再加上穆斯理个人好大喜功，在任职期间大兴土木，使教会在经济上更加困难，引起教内外的怨恨，最终在罗马教廷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恢复与发展

5.1 希贤时期军阀混战中的大发展

民国时期，天主教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外部的军阀混战。继晚清的灾荒及战乱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大混乱时期，不仅对人民生活 and 全国经济的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时再次为天主教传播提供良好的机会。

当穆斯理辞职时，西班牙传教士在陕西关中教区已占了绝大多数，声势浩大，很有可能夺取教内领导权的倾向。为了稳定关中教区的形式，平息长久以来的教内纷争，罗马教宗并未任命陕西教区的西班牙教士为主教，而是选择了山西太原的希贤主教担任陕西中境教区的主教。希贤(Eugenio Massi)，意大利人，1909 年代凤朝瑞为山西太原主教。当时凤朝瑞主教把持太原所有宗教大权，希贤不愿充当凤朝瑞的傀儡，两者矛盾日益加深；正值此时，陕西教区主教穆斯理提出辞职，西班牙会士觊觎陕西主教一职，罗马教廷抓住机会，任命希贤为陕西主教，轻而易举的解决了陕西和山西的问题，也由此结束了陕西教区长久以来的争斗，使得以后陕西教区的发展获得一个较为稳定的内部环境。

希贤任职从 1916 年至 1928 年，长达 12 年。这段时期，陕西军阀割据，互相攻伐，给各地带来极大地灾难，高陵一地也不能幸免。如 1926 年，直系军阀镇嵩军刘振华围困西安，派麻振武师驻守高陵，之后是梅发奎部。梅发奎驻守高陵之后大肆搜刮，命令居民 3 天之内交出金银首饰，^[56]但是唯独通远坊地区幸免。究其原因，不得不承认教会在这一个时期的作用，尤其是主教希



图 7 圣母会建筑遗址

贤的作用。原来希贤为人圆滑，在战乱时为保全教堂同各方面都互通生气，再加上他的背后又有国外势力作为依靠，所以当时军阀才不敢覬覦通远一地。而通远城也成为当时人们避难的场所。这其中不但有一般的士绅富豪，甚至包括军队首领的家人，曾任陕西

^[56]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485

靖国军总司令的郭坚，他的大夫人便在通远坊保赤会内住过，躲避战乱。^[57]据统计，当时在此避难的人达到一万人之多。

希贤时期，高陵天主教虽然面临危险地外部环境，但总体来讲，都是有惊无险；而且由于内部纷争平息，所以教会还是得到了发展，主要有 1923 年创立了“耶稣圣心方济各第三修女会”。耶稣圣心方济传教修女会简称“圣心会”，本名方济各第三修女会，当地俗称“黑会”，其名称的由来也是因为此会的修女服装为黑色。1923 年由希贤和另一个西班牙人创立，并经过罗马教皇的批准，地址就设在高陵通远坊，也是从这个时期起，圣心会成为中国天主教修女自己的组织。这两个修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妇女中传教、帮助神父处理教内事务。同时修女会还兼办教会的慈善事业，“保赤会”即负责这些事务的主要机构，如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这些慈善机构发挥了较大作用，如“天主教教育婴堂，以教养名义曾收养社会上许多弃婴、孤残儿。”^[58]而这个修会的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在妇女中进行传教，争取更多的女性教民；同时实行“全家归主运动”，即利用教徒劝说尚未信教的左邻右舍或亲人入教，而且必须是“男子一人入教，男子一家皆教民也”。^[59]并且依据天主教教规，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人入教便全家入教；一家之中，只要父母信教，那么孩子出生八天便进行“洗礼”入教；一家之中只要男子信教，全家便集体入教。可以看出，此时的天主教传教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并趋于多样性。不但利用灾荒战乱和各种慈善事业来吸引群众入教，而且注重采取各种方法，一个一个村庄、一个一个家族的去争取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因此，此地的天主教民人数在战乱时期，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928 年，全县教民 1497 人，其中男性教民 746 人，女性教民 751 人，^[60]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教民人数，是当时关中地区名副其实的传教基地和活动中心。

5.2 戴夏德时期的持续发展

希贤任职的后期，由于还要管理汉口地区的教务，所以难以顾及陕西教区的事务；再加上各地战乱，交通不便，所以很少回高陵地区。而陕西教区事务主要由当时任神学

^[57]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30

^[58]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451

^[59] 高陵文史委员会编. 高陵文史资料[G]. 185

^[60]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75

戴夏德时期，高陵天主教持续发展，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高陵天主教也因其各种暴行而遭到当地人民的法抗，直至新中国成立，教堂权利收归中国人民自己管理。

5.3 民国末期中外矛盾中的高陵天主教

希贤任主教时，因为教会的不断发展，便有意将关中教区进行划分。到戴夏德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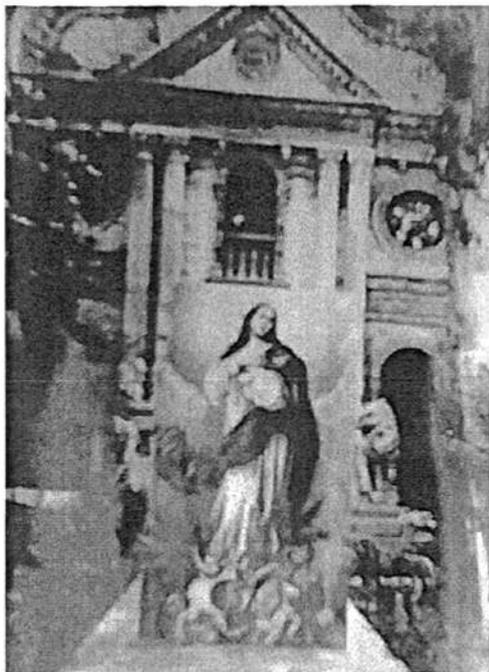


图9 二十世纪中期的教堂

期，即呈请罗马教廷将关中划分为西安、三原、大荔和凤翔四个教区。至1932年梵蒂冈传信部划分西安总教区为西安、三原、周至、大荔和凤翔五个教区。三原教区归意大利威尼斯方济各会传教范围，设三原主教府，管辖高陵、富平、泾阳等13个县城。^[65]自此高陵一地归属三原教区辖内。

这一年，班锡宜(Fulgetius Pasini)也被罗马正式委任为三原教区首任监牧主教。此时，伴随着中外矛盾在中国的激化，全国人们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在高陵地区，人们的爱国意识也逐渐的加强，对于当地教会人士的反华反人民的行为，开始了激

烈的反教会的运动。再加上班锡宜此人历来蔑视中国，认为“中国野蛮”^[66]，所以在他任职时期，高陵地区中外矛盾激化。

高陵当地的中外矛盾集中表现在外国天主教教士同中国学生及外国教士同中国神父之间。第一对矛盾早在戴夏德时期便已经出现，主要原因是因为戴夏德对于班锡宜排斥中国人做法的支持。到班锡宜任职期间，更是变本加厉，致使矛盾不断的激化，发生多次神学院学生的反抗运动。此时的神学院（又称神哲学院、修道院或者修会），位于大教堂西150米，占地面积约7.36亩，主要是培养中国神父，陕西在没有划分教区以

^[65]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 三原县志[G].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981

^[66]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228. 案卷号129. 1963: 40

前，所有的中国神父都是在这里进行学习的，据统计大约一百多人，^[67]对于陕西及高陵天主教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所以历来院长的人选都非常重要，历届的主教都曾担任过这一职位；而神学院教师也都多由外国教士来担任。1928年戴夏德任命班锡宜为神学院院长，负责神学院学生的教育工作，但是班锡宜在教学期间“对于中国青年学生，常施以压迫和愚民教育，而乐其谄媚逢迎唯帝国主义之命是。”^[68]神学院学生忍无可忍，遂于1929年发起反抗运动，声势浩大，并且同时有十多人主动退出修院。戴夏德不得已将班锡宜免职，但是又在1931年突然再次任命他为院长。戴夏德的支持助长了班锡宜的嚣张气焰，继续迫害中国学生。为了进一步压迫中国学生，他还举荐了另一个与他持有相同斥华思想的威尼斯人——佳满德主管小修院，此人上任之初便开除了三十多名爱国的学生。佳满德更明目张胆的向修生说，没有你们，我们有的是人，同样能办教会。^[69]他的暴行终于激起了学生在1931年的再次反抗运动，但是由于学生们在运动中缺乏计划，缺乏统一领导，所以这几次运动最终都被镇压下去。

中外矛盾另一个表现是中外神职人员的矛盾上。班锡宜任职期间，全国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依靠国外势力在中国发展的天主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加强并发展天主教在中国的力量，班锡宜在教会内部大力排斥异己力量。班锡宜上任三原监牧主教后，“将所有的中国神职人员都贬到边远地区，将所有较好的地盘和较重要的职务，皆交与外国神父之手。”^[70]同时，在1946年，梵蒂冈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国的宗教势力，实行了有名无实的“圣统制”，任命众多的外国主教掌握各个教区的实权，并且不能随意调动。由此，当时全国二十多个总主教区，只有三个中国人担任主教；一百多个主教区，只有二十多个中国人担任主教，其余都是各国自己的人选，这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反常现象。^[71]罗马教廷在此时在中国实行“圣统制”，其真正的意图是将中国教区的宗教大权牢牢掌握，以此来对抗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原来罗马教廷在中国问题上一贯的态度是支持美国以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而班锡宜等外国教士更是秉承罗马教廷的旨意，参与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中，“圣统制”更使得班锡宜牢牢掌握了当地宗教大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在教

^[67] 宗怀德. 三原教区主教. 采访时间: 2009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68]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228. 案卷号129. 1963: 41

^[69]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228. 案卷号129. 1963: 41

^[70]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228. 案卷号129. 1963: 42

^[71] 陕西省档案馆存.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228. 案卷号129. 1963: 43

堂内私设电台，并且搜集情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此外，班锡宜上任以后，并不满足于高陵一地，极力扩张教会势力，决定在三原城内再建总堂。当时正是旱灾之后，人民生活还未恢复，利用这个机会，他在当地廉价购买了一大片土地建设总堂；建堂期间雇佣意大利犯人做总管，虐待工人，最终建起了三原总堂。

1952年，班锡宜等人因压迫中国人民，作恶多端，被驱逐出境。^[72]他的离去，结束了外国人把持高陵天主教事务的历史，从此之后，教会的领导权开始由中国神职人员掌管。同年，通远坊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73]对当地宗教进行了改革，从此高陵天主教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宗教，真正实现了中国教务中国人自己管理。

表1 1936年通远天主教堂情况

主管人		班锡宜	
籍贯		意大利	
信教人数	男 本国籍	教民六百四十五人，教士三人。	
	非本国籍	教士六人	
	女 本国籍	教民九百零二人	
	非本国籍	九人	
资金来源		募捐	
财产	本堂附属或享有	房屋间数	大楼三座，房屋三百四十二间
		土地亩数	一百九十五亩
		房屋间数	六十间
		土地亩数	四十亩
兴办事业	名称	孤儿院、养老院、养病院、光华学习	
	经费来源	由本堂临时共给	
	年需经费	约九千五百余元	

代理高陵县长：陈家珍^[74]

^[72]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462

^[73]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676

^[74]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政事务委员会. 陕西各县天主、耶稣教堂、回族清真寺概况调查表(1951—1966)[G]. 全总号 228. 1312 卷

第六章 高陵天主教发展特点及影响

6.1 发展的特点

6.1.1 高陵天主教在建国前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主教手中。

天主教内的教阶制度分为教皇、主教、司铎（又称神父或神甫）三个等级。其中教皇是天主教最高首领，掌握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最高权利，控制世界天主教会；主教是一个地区的天主教会首领，负责监督并负责其管辖内的天主教会，有施行七件圣事（圣法即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的权利，并可授予司铎品位，在教皇召集世界天主教大会时有出席权、发言权。司铎则负责所在教堂的具体传教事务。可以看出，主教是掌握着教区的实际权力，罗马教皇为控制各国天主教，曾规定主教需由教皇委任，或由教区推荐经罗马教廷批准任命。但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天主教会不执行教廷这一规定。如日本天主教的主教，是由日本天主教会选出由政府批准，而且被选出的主教不能宣传罗马天主教奉行的“原罪”，要承认天皇是“神”。日本天主教自开始便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将宗教大权牢牢控制，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但是天主教进入中国之后却完全不是这样。从明末至建国前的近四百年间，中国天主教内的主教绝大多数都是有罗马教廷直接任命的国外主教。1924年，教皇庇护十一“敕令”北京教区主教刚恒毅召开“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49个“中国主教”中，47个是法、意、德、荷、西、比等国人士，只要2个称“鉴牧”的主教是中国人，而鉴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教，其地位要低于主教。并且这两人还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刚刚任命的。^[75]而在陕西教区内情况更是如此。晚清民国一百年的历史中，历任高陵天主教主教副主教的人员有13人，但是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没有一位中国神职人员担任这一职位。

外国人长期把持中国教会大权，这是外国宗教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一个表现，这种形势的形成也是由近代中国政治形势决定的。纵观天主教的对外传播的过程，一度依靠本国强大的政治势力达到其目的。晚清至近代是中国饱受侵略的时期，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天主教也从明末的友好传播变为依仗不平等条约和强权的极力扩张，扩张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运用各种手段掌握各个教区主教人员的任命，掌握各教区宗教大权。主教由于拥有实施七件圣事的权利，所以不仅在精神上掌握着教区信徒的去从，并且在实质上也掌握一个教区的各种大权。在任命主教时，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经过罗马教廷的批准并“祝圣”，否则不会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即使某教区要摆脱罗马的

^[75]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70

表3 历任主教副主教人员表^[76]

姓名	会籍	国籍	职位	在职时间	备注
方启升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主教	1731—1741	
罗雅静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主教	1830—1844	
冯尚任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附 注1	1845--1848	兼管山西教务
高一志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847--1884	
林奇爱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884—1900	
魏比约	方济各会	意大利	副主教	1886—1900	
郭格勒 孟多	方济各会	意大利	副主教	1900—1901	1900年被祝圣为 主教
聂长春	方济各会	意大利	被选时已死	1901	早逝，未被祝圣
何理熙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02—1905	
胡定邦	方济各会	德国	代牧主教	1905—1908	
穆斯理	方济各会	法国	代牧主教	1908—1916	
希贤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16—1928	
戴夏德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28—1932	1928年后专管汉 口教务
班锡宜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32—1953	专管三原教区事 务

控制，只是主教任命一项中便无法通过，或者教宗就会使用“绝罚”，那么教徒死后便不会进入天主教所宣扬的天堂了。其实在中国天主教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尤其是高陵天主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教徒也一直是罗马教廷惟命是从的，在他们心目中，也只有罗马教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不经过罗马教皇的“祝圣”，即使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也不是正宗的天主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解放后，这也体现出近代中国当地天主教发展中中国教徒对罗马教宗的盲从性，而罗马教宗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76] 此表参考李伯毅《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一文。

附注1 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区制度，教皇委托他人代为治理教务的替代制度。传教区由高到低可分为三种：代牧区、监牧区和自立区。陕西教区属代牧区，所以主教又称代牧主教。

以达到控制教区事务的目的。

6.1.2 罗马教廷的重视，不间断的派驻主教、神父。

高陵天主教是在中国禁教的严酷时期创立，这个传教中心的建立开创了天主教在西北地区新的发展历史，对于天主教在内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百年禁教时期，天主教在内地以至西北地区的势力被驱逐殆尽，教堂被拆毁或改作它用，信徒也几乎完全丧失。著名的例证便是陕西第三任主教方启升，为躲避清政府的驱逐，他曾躲入秦岭深山中，至今民间还有一首《方主教避难歌》流传，记录当时陕西地区天主教情况。^[77]方启升之后的冯尚任将陕西天主教总堂建立在高陵一地也是因为清政府的禁教。这个传教基地虽然地处偏僻，但却可以避人耳目，同时又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当时的困难时期为陕西天主教的发展以至后来的壮大开创了新局面，由此受到罗马教堂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主教的人选上，这一时期的担任主教的人大都性格和善，头脑灵活，在传教方法上非常得当。因此，大大促进了天主教的发展；同时，为支持当地教务发展，罗马教廷在以后不间断的向高陵一地派遣传教士。除此之外意、法、德、英、西、美、荷等十一个国家也都先后向当地派遣过传教士，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也大多只知道高陵的通远一地，而这里的神哲学院培养了大批的神甫。

6.1.3 地处偏远，发展稳定；传教中心，势力庞大。

高陵一地由于相对其它的地区较为偏远，所以对于当时还处于地下的天主教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再加上通远地区更是远离省会西安及高陵县城，所以更加安全。地处偏远，但当地也非常的荒凉，在初期当地仅是一片荒地，但最终天主教教士们克服困难，在当地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起来。在清末民国一百年的时间里，将一片荒地发展成为占地 340 亩、建筑面积达 230 亩的庞大规模，并且教民人数也稳定发展，最初信者少，1878 年约 700 人，1929 年约 1310 人，抗战时期约 1500 人，解放初期约 2087 人。^[78]再加上，通远城墙的修筑，更使得当地天主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俨然租借地，当地政府一方面因为地处较远，疏于管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国教堂所在地，所以更不愿干涉其中。因此，高陵天主教顺利发展。另外，高陵地区的天主教徒大多聚集在通远坊一地，并逐渐形成以通远天主教堂为中心、覆盖周边村庄的传教中心。在这个中心地带，信徒聚居，人数众多，占到全县教民人数的 60% 以上。而且，天主教在此地威信很高，不仅是教民的日常生活，即便那些不信教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要围绕教堂展开。生活中大到

^[77]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 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11

^[78] 高陵文史委员会编. 高陵文史资料[G]. 184--186

娶妻生子、老人去世要请神父来做弥撒，就是平日中的邻居相处也有关系，信教的人们之间便要比与不信教得人之间要亲近许多。由此，天主教在无形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6.1.4 历任主教传教方法得当，利用各种方法和时机吸引人民入教。

高陵天主教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传教法上的灵活性。康熙时期，由于教宗的不当措施，导致清政府的百年禁教，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鉴于此，以后的天主教传教士逐渐改变了传教策略。在天主教历史上，主要的传教方法是传教于上层统治者，吸收了统治阶层入教可以为天主教的传播创造很好的条件。事实证明，在利玛窦时期，以及后来的汤若望等人传教时期，中国天主教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这种传教方法使得天主教的发展过分的依赖于上层统治者，所以一旦失宠便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后来的“百年禁教”，在天主教历史上又称为教难。禁教时期的天主教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同时也被迫改变传教的重点，改为主要在下层人民中传教，这也正是天主教在禁教时期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而晚清时期，冯尚任选择高陵一地作为陕西新的传教中心也正是体现其传教策略。再加上以后的历任主教，不失时机的利用各种机会扩大教会的影响，如兴办孤儿院、养老院、慈善医院等慈善事业，以及采取各种方法吸引或强迫群众入教，如高一志时期利用赈灾规定不入教的人就得不到救济，虽然高一志主教由于发展教徒心切，不问贤愚都批准入教，但是确实大大的促进了教民人数的增加。天主教在教民聚居地规定，家中如有一人入教全家便都入教；家中如果父母入教，那么孩子在出生后也即入教。通过这种方法，环绕着天主教堂的周围村庄中几乎家家入教、村村信教。以上历任主教的传教策略都不同程度上说明，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了发展自己，努力的适应中国的国情，在遭遇困难时，都能适时的改变自己的传教方法，这也是天主教能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上述的特点外，当地天主教的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愈是战乱灾荒的时期，天主教发展愈快。如 1862 年回民起义时期、1878 年陕西地区灾荒和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发展。在这几个时期，天灾人祸并未影响到当地天主教的发展，相反，天主教却得到了迅速发展。究其原因，多年的战乱和灾害使得百姓民不聊生，生活极端困苦，而这种困苦在现实中找不到丝毫的解决的方法，天主教大力宣扬的信我主便可解脱、死后即可入天堂的信念正好符合了百姓们寻求精神解脱的需求，再加上，天主教多次赈济灾民以及大力兴办的医药、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事业，虽然在灾荒战乱时期许多人入教是为了“靠教”“吃教”，但是教会的这些做法确实在现实中解决了人民的一些苦痛，这就使

得天主教更具有现实的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战乱灾荒时期，当地入教的人数愈多，教会的势力发展的愈快，这不但是当地天主教发展的特点，而且整个陕西地区宗教势力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6.2 影响

6.2.1 天主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天主教奉行“十诫”，其主要内容是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等。这些戒条都主张教民行善，不做坏事，从思想上净化了当地群众及当地的民风。再加上，清末民国时期高陵地区本就民风淳朴，对于外来事物并不排除，所以天主教教义更容易在当地群众中传播。不仅是信奉天主教的教民信奉这些戒条，即使是没有入教的人们对于这些主张也是非常赞成的，并在自觉不自觉中遵循着教规。除了十诫，天主教还有一些禁忌，其中离婚禁忌、堕胎禁忌，以及主张一夫一妻、禁止妇女缠足等，这些对于当时的闭塞的高陵来说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针对当时盛行的鸦片种植天主教也是反对的，主张严厉禁止，如胡定邦时期便曾经派神父将教徒家将要到成熟的鸦片全部捣毁，虽然方式上非常粗暴，并遭到教民的反抗，但是其初衷及最终达到的效果却是好的。对于禁烟当时的人记述：“禁种鸦片不啻三令五申周边田亩似多加焉，何长官不如主教之出治，和小民不如入教之，从治此当愧自省者也。”^[79]

6.2.2 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

天主教对于高陵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民国时期陕西关中地区出现多次严重的旱灾，其中1928年至1930年连续三年大旱，全省80余县受灾，死亡以及外出逃难的人数以百万计。为此，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决定兴修水利，这就是有名的泾惠渠。从1930年开始，经过四年的时间，终于在1934年底完成工程。这条水渠流经高陵、三原、临潼、礼泉和泾阳5个县城，灌溉田地达69万亩，最终解决了关中地区的旱情。而修建这条水渠的经费除省政府拨款外，还有属天主教慈善机构的华洋义赈会的募捐款。^[80]至今高陵当地的人对此还念念不忘，心存感激。泾惠渠的修建不仅解决了旱灾问题，而且由于有了水利的保障，泾惠渠流经的地方农业生产也逐年增长，由此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证，促进了各县经济的发展。泾惠渠至今还在使用。

^[79] 据张元际（清）纂修。光绪三十二年抄本影印。兴平县乡土志[G]。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74

^[80]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G]。西安出版社。2000：163

另外，天主教也为当地带来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戴夏德主教，在他的任职期间所带来的发电机、地震监测器、气象台，都曾经服务于当地群众，便利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西方知识的传入，以及天主教兴办的光华学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当地先进文化知识的传播，也为中西文化知识的交流作出一定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开启当地群众的思想，在严格要求人民尊奉天主教诫条、学习先进知识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陋习。因此，虽然高陵通远等地地处偏远却民风开放，人民多知书达礼，孩子自小时候起便在教堂学习，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地天主教。

但是，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天主教的不足之处。纵观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历史，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曾出现长时间的混乱，教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排挤，不仅外国神父内部各派别之间进行争斗，同时还包括外国神父对中国神父的欺压和排挤。而这些都源于中国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高陵天主教的起步和发展壮大，以及他的辉煌发展时期都处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它的传入是伴随这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侵略性质。虽然教会大力兴办慈善事业，开办学校，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教民数量、扩张宗教势力；同时，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带有很大的优越感，对当地教民和群众横征暴敛，诸如占据民田、干涉群众正常的生活等行为，在当地引起恶劣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教会与民众的冲突；随着中外矛盾的激化，进而又压制当地人民的反帝行为，并最终支持反动派打内战，这些都是天主教的不足之处。所有的这些行为追其根源也都是因为天主教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和文化代表，最终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其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本质是无法改变的。不但如此，天主教作为一种一神信仰的宗教，要求教民严格遵守教义教规，只信奉天主教一个宗教，对于其它宗教具有强烈的排斥心理，这种宗教信仰政策对于我国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来说是不利的，长此以往，会造成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利于宗教的正常健康的发展，在当地信教群众对不信教群众的排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总之，从近代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外国宗教在中国发展需要合理的宗教秩序，最终需要中国人自己掌握教权，把握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

结 论

高陵天主教自清末开始正式传播，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天主教在当地拥有强大的宗教力量，在群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的开放，为此地的天主教发展再一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近年来，当地信教人数大量增长，信教群众的年龄也趋于年轻化。相信在以后，宗教势力也将会稳步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此地的天主教力量如此强大呢？那么天主教又是如何在此地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纵观高陵天主教整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清末，随着国门被打开，天主教也倚仗不平等条约大肆的进行传教活动；同时，许多优秀的传教士也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的调整传教策略，使得这个地区的宗教活动能够顺利的展开。高陵天主教的发展状况便是全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清末民国天主教在中国成功传播的一个典范。由本文可以清楚的了解当地天主教及陕西地区天主教传播的历程，同时也可从侧面把握天主教在中国国内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类

- [1] 陕西档案馆藏. 关中天主耶稣教堂回教清真寺概况调查表〈1951—1966〉[G]. 全总号 228, 案卷号 1312.
- [2] 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 全宗号 228, 案卷号 129, 1963 年.
- [3] 陕西省档案馆藏. 通远坊天主教近况[G]. 全总号 123, 目录号 8, 案卷号 14.
- [4] 高陵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高陵文史——高陵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G].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 [5] 吕楠(明). 高陵县志. 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影印[G],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刊行.
- [6] 程维雍(清)修, 白遇道(清)纂. 高陵县续志. 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G],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7] 中国史学会主编. 回民起义[G]. 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8 月.
- [8] 据张元际(清)纂修, 光绪三十二年抄本影印. 兴平县乡土志[G].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9]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 三原县志[G].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清末教案[G].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 [11]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市志[G]. 西安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 [12] 据民国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影印. 鄂县乡土志[G].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
- [13]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陵县志[G]. 西安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 [14] 据清舒其绅修、严长明纂, 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影印[G]. 西安府志.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 [15] 陕西省图书馆藏, 谢大林、徐大平、杨居灏主编. 蓝田乡土志[G]. 北京图书出版社.
- [16] 周至县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周至县志[G]. 三秦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 [17] 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户县志[G]. 第四测绘大队印刷厂印刷, 1987 年 4 月版.
- [18] 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泾阳县志[G].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 [19] 富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富平县志[G]. 三秦出版社出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 [20] 兴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兴平县志[G].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二、论著类

- [1] 谢和耐. 中国宗教和基督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2] 黄心川. 世界十大宗教[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 [3] 周燮藩. 中国的基督教[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91 年
- [4] 朱谦之. 中国宗教[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年

- [5] 唐逸. 基督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 [6] 窦习哲. 王征[M]. 西安: 纪念王征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作, 2004, 4
- [7] 于可主编. 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7 月, 第三版。
- [8] 季羨林主编. 中外宗教交流史[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 [9]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编. 中国宗教概况[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年 2 月第一版
- [10] 曹中建主编. 中国宗教年鉴 2003—2004[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 [11]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士概论[M]. 上海书店, 1990 年
- [12] 晏可佳. 中国天主教简史[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 [13]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 [14] 郭琦, 史念海, 张岂之主编. 陕西通史[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15] 金泽, 邱永辉. 中国宗教报告[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 [16] 王雪. 基督教与陕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 [17]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过去和现在[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第一版
- [18] 董柱国. 高陵碑石[M]. 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 [19]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 [20] (美) 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 [21] 张晓林.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 月第一版
- [22] (美) 奥尔森.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8 月
- [23] 陈钦庄. 基督教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 [24]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发行, 民国 23 年 1 月第一版
- [25] 陈村富主编. 宗教与文化[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 [26] (英) 约翰·麦奎利. 基督教神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 [27] 段琦.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M]. 事务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 [28]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 [29] (美) 何凯利.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 [30] (美) 彼得森. 基督教简史[M]. 上海: 商务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一版
- [31] 杨天宏. 基督教与中国知识分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一版
- [32] 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 [33] (瑞士) 巴特. 教会教义学[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 [34]黄一农.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8月第一版
- [35] (美) 阿尔文·普兰丁格.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一版
- [36]龚道运. 近世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 [37]陈建明、刘佳峰.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M]. 成都: 四川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 [38]黄新宪.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7月第一版
- [39]徐以骅.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
- [40]黄保罗.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一版
- [41]史静寰.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年7月第一版
- [42] (法) 卫青心.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11月第一版
- [43]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第一版
- [44]刘家峰.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 [45]张先清. 官府、宗族与天主教[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年5月第一版
- [46]卓新平. 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 [47]艾略特. 基督教与文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889年7月第一版
- [48]王晓朝. 信仰与社会[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 [49] (英) 托伦斯. 神学的科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
- [50] (德) 莫尔特曼. 俗世中的上帝[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
- [51] (英) 约翰·德雷恩. 旧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一版
- [52]尹文娟. 基督教与近代中等教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第一版
- [53]庄祖鲲.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 [54]陶飞亚. 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8月第一版。
- [55] (德) 于尔根·莫尔特曼. 来临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终末论[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6年9月第一版。
- [56] (英) 迈克尔·基恩. 基督教概况[M]. 上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
- [57]王秀美. 基督教史[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第一版。

三 论文类

- [1] 田淼,张伯春. 王征—欧洲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传播者[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第9卷第6期2007,

- [2] 王欣瑞. 近代基督教传入陕西及陕西农民入教原因探析[J]. 西北大学学报, 2004年1月底34卷第

1 期

- [3] 张晓红. 陕西天主教教区初步研究[J]. 中国天主教
- [4] 张晓红. 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国之状况[J]. 圣教杂志, 24 卷 8 期
- [5] 李存娜. 1949 年以来中梵关系变化三阶段[J]. 国际资料信息, 2003, 10
- [6] 张晓红. 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J]. 复旦学报, 2002 年, 6
- [7] 王雪.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J]. 唐都学刊, 2007 年 1 月第 23 卷第 1 期
- [8] 李伯毅. 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J]. 中国天主教, 2000 年第 1 期
- [9] 张多默. 中国天主教现状[J]. 中国宗教, 2004, 3 月。
- [10] 余光. 天主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J].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1994—2007 辑。
- [11] 刘建平. 近代天主教在陕西八个教区的形成和发展[J]. 中国天主教, 2007 年第 4 期。
- [12] 朱崇钰. 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民国时期基督教研究述评[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0 期
- [13] 闫玉华. 儒教与基督教对中西方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5 期。
- [14] 李凡. 清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佛山传播的空间透析——以教堂景观为视角[J]. 热带地理, 2009 年第 5 期。
- [15] 南措姐. 基督教在西藏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刍议[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
- [16] 陈乾.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主要活动与影响[J]. 才智, 2009 年 26 期。
- [17] 宋美玉. 论宗教传袭方式对宗教信仰的影响[J]. 才智, 2009 年 25 期。
- [18] 刘春红.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的宗教救赎意识[J]. 湖北社会科学, 2009 年 10 期。
- [19] 万智杰. 基督教意识在西方哲学中的作用[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 年 S2 期。
- [20] 孙丽娟.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9 年 5 期。
- [21] 程翠英. 疏离与忠诚——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历程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9 年 4 期。
- [22] 石刚. 对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不同历史际遇的反思[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9 年 4 期。
- [23] 卢红. 论晚清基督教在华慈善组织与传统慈善组织[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9 年 7 期。
- [24] 林曼红. 内地基督教发展公益事业的必备条件刍议[J]. 金陵神学志, 2009 年 2 期。
- [25] 王俊. 浅论基督教的社会身份. 金陵神学志, 2007 年 4 期。
- [26] 黄金刚. 韦福安. 晚清教会学校探析[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7 年 3 期。 .
- [27] 杨齐福.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11 期
- [28] 赵慧峰.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效应[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年 4 期

[29]李传斌.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J]. 南都学坛, 2005 年 4 期。

四 采访类:

[1] 宗怀德.三原教区主教.采访时间: 2009 年 8 月 20 日.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2] 张忠和.曾任通远教堂会长.采访时间: 2009 年 8 月 15 日.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3] 吕建政.高陵民政局退休干部.采访时间: 2009 年 7 月 10 日.采访地点: 高陵。

[4] 李桂芝.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导师.采访时间: 2009 年 9 月 10 日.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5] 宗世凯.高陵张白教堂神父.采访时间: 2009 年 9 月 11 日.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6] 马增玉.通远村民.采访时间: 2009 年 6 月 18 日.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7] 肖盛合.通远村民.采访时间: 2009 年 6 月 18 日.采访地点: 高陵通远。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 闫华. 重构思想世界——论洪秀全早期思想转变[J]. 新西部. 2008, (8)
- [2] 闫华. 通远坊天主教发展现状概述[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1期. 2010, (2)

致谢

三年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回顾三年的学习生活，感受颇深，收获丰厚。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无论是在理论学习阶段，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所以首先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陈国庆教授。

陈老师知识渊博、思路开阔，总能把握知识的最前沿，在他的引导下，极大的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本篇论文的写作打下了理论基础。在论文撰写方面更是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除了在学习上给予指导外，生活上也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点。陈老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认真勤奋的工作作风，以及宽容无谓的生活态度将会一直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勇往直前。

同时，我要感谢梁星亮老师、杨洪老师、李刚老师、王建军老师、张晖老师、赵璐老师等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不但使我掌握了更加详细的专业知识，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求知治学、如何为人处事。他们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在闲聊中总是能像知心朋友一样鼓励你，在论文的写作和措辞等方面也总会以“专业标准”严格要求你，从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深刻而细致地指导，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正是老师的无私帮助与热忱鼓励，我的毕业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谢谢老师！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同学给予我的帮助，他们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不少建议和帮助。还要感谢三年的生活，感谢我的家人和那些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朋友，他们的支持与情感，是我永远的财富。

最后，衷心感谢于百忙之中评阅论文的各位老师、教授！

谢谢！

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史研究

作者: [闫华](#)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7839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a1c49aa-ee89-4431-bb5d-9e4d006f430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